

编者按:军事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从人类社会军事诞生之日起,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军政关系便应运而生。与此相应,人类对军政现象和军政关系的研究也如影相随,不绝于缕。虽然关于军政现象和军政关系的研究源远流长,但以军政现象或军政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的出现却比较晚,学术界提出以军事政治学命名军政现象或军政关系研究则更晚,在中国大陆军事政治学甚至还是一门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研究,特别需要呼吁创立的新兴学科。有鉴于此,本刊特辟专栏,探讨军事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为军事政治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军政现象与军政关系探微^{*}

——兼论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核心问题^①

● 高民政

摘要:军事政治学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军政现象,以探求军政关系发展规律为目标的一门军事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当代世界存在的三大军政关系实践形态及其理论依据各具特色。正确评价军政关系必须确立和遵循客观的评价原则和方法,不断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治学理论,积极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军事政治学,并充分发挥其学术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军政现象;军政关系;军事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E0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9)01—0152—06

作者:高民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军政现象”:军事政治学研究的对象

在英语中,“军事政治”或“军事政治学”(military politics)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1962年所编的《变迁中的政治模式》一书中。亨廷顿曾在该书导论中以

^{*} 本文为军队院校2110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立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① 大陆学界虽然曾有过关于军事政治学科知识的介绍,也有国外军事政治学研究状况的评介,以及学者撰写的从内容上看属于军事政治学范畴的学术论文,但却没有一本军事政治学为名的著作,笔者曾在多个学术会议上呼吁加强军事政治学研究的问题,也撰文从政治学与军队政治工作学关系的角度,就构建中国军事政治学的可能性做了初步探讨。(具体参见高民政、赵景刚:《政治学与军队政治工作学——兼论构建中国军事政治学之可能》,《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新军事政治(学)”为标题,介绍该书几篇专论所提出的军事政治理论和描述国际关系中的军事政治现象。亨廷顿虽然没有在导论中直接解释军事政治的具体含义,但却在该书附录《最近军事政治(学)文献》的序言中指出,“军事政治”或“军事政治学”“包含、但超过军事政策,因为军事政治(学)还包括有关军事体制本质方面的非政策取向之研究,以及军事体制与其他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关系。”从他对“军事政治”或“军事政治学”文献的7大类文献^①分析看,亨廷顿所说的“军事政治”或“军事政治学”实质上就是从政治角度研究军事事务和军事政策,也就是对军事政治现象的研究^{[1]2-3}。自从亨廷顿提出“军事政治”或“军事政治学”概念以后,随之被不少西方学者广泛采用。

在汉语中,“军政”就有“军事和政治”、“军队和政府”、“军事上的行政事务”等含义^{[2]79}。“军政”与“军事政治”具有基本相同的词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军政”看作是“军事政治”的简称。“军事政治”虽然是由“军事”与“政治”两个词合成的,但绝对不是两个名词、两种事物的简单相加,而是既表明了军事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反映和揭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军事政治现象,亦即军事中的政治现象和政治中的军事现象。

台湾军事政治学者洪陆训认为“军事政治”就是“指涉军队内部的政治面向(如组织性质、组织文化、专业主义等),以及军事与政治或军队与政府的关系,亦即军事与政治现象。”“军事政治学是研究军事政治事务和军政互动现象的政治学分支,以涉及军事事务的政治议题或涉及政治事务的军事议题为研究取向,即是以国家安全的军事政治层面为研究重点。”^{[1]18}

根据以上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军事政治学即为军事政治现象研究不断深入的学科化产物,是一门以人类社会军事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军事学与政治学的交叉性学科。从广义的角度观察,军事政治学意味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只要是将军政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不管使用何种理论工具和学科视角,都可视为军事政治学范畴;另一方面,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军事问题的范式存在,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比如军事社会、军事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即只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军事问题,均可纳入军事政治学范畴。

二、“军政关系”:军事政治学研究的核心

虽然将军事政治现象作为军事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在学界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但在对“军事政治现象”的范围界定上达成一致却并非易事。因为西方学者有关军事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了军事学的所有主题,特别是与军事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多有重叠之处。仅洪陆训在其《军事政治学》一书中曾经罗列的军事政治学研究主题就有18项之多,主要有:文武关系;军事专业主义;文人统制;军人干政、军事政变;军事政权的运作与转型;军工复合体;军事干预(海外出兵)与维和行动;军事主义与军事化社会;军队与国会;军队的政治角色变迁;共产党国家的党军关系;国家(国际)战略;“信任建立措施”、“预防性外交”;“低度冲突”与“反恐行动”;战争与和平;军事与外交。作为一个在美国留学并深受西方影响的台湾军事政治学开创者,洪陆训关于军事政治学研究的18项主题,

^① 亨廷顿所分的7大类军事政治文献是:战略与战略理论;美国军事政策;军队政策过程和文武关系;武器、科技和军事政策;军事事务理论和准则;战争史和战争分析;各国军事事务。

大体上概括了西方学界的军事政治学的主要研究范围。

虽然西方学者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军事政治学者论及的军事政治学主题很多,但仔细观察,实际上其核心问题都集中在军政关系上,即所有的主题都直接或间接与军政关系相联系,围绕着军政关系而展开,其军事政治学的主要成果也集中在军政关系方面。事实上军事行为与政治行为密切相关,军事政治现象本质上都是军政关系的反映,军事政治行为则是一定军政关系的动态表现。如此说来,军政关系便成为军事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核心主题。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军事政治学几乎可以称之为“军政关系学”。

开展军事政治学研究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明确什么是“军政关系”。顾名思义,军政关系就是“军”与“政”的关系。但随着“军”与“政”的理解范围不同,军政关系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虽然可以说军政关系就是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但由于人们对“军事”和“政治”的本质及其范围理解同样也有区别,因此对军事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也有差异。

通常意义上的“军”,作为行为,可指军事;作为成员,指军人;作为组织,指军队;作为区域,指军营;作为资源,指军备……。“军,就是兵队;事,凡是人类所作为所遭逢的,就叫事。把军和事两个字连接起来,就是关于用兵的一切作为、遭逢,就叫军事”^{[3]1}。众所周知,自从人类产生军事活动以来,战争就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用兵”——军事行为。战争是“一种迫使我们的敌人屈服于我们意志的武力行动”^{[4]296}。“如果说战争是两个和平时期的中断,那么可以同样确切地说,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歇。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警句,它具有名副其实的重大意义。”^①这意味着,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如何预防、发动或控制战争是人类面对的永恒主题之一。因为,在不同利益主体的欲望、需求无限增大而现有资源是既定或有限的情况下,战争往往会成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但战争行为不仅仅是牵扯到军人和军队的军事行为,很可能是涉及到军人和军队之外的所有武装力量。由于军队始终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主体和武装力量建设的重点,各国的武装力量都以正规部队为主,因此,人们通常把军队与武装力量通用。但严格说来,武装力量还包括正规军队以外的其他暴力组织形式。因此广义上的军事不仅仅与军队相联系,而且与整个武装力量有关。在英语中,军事(military)一词的解释就是 performed or supported by the armed forces,意为武装力量的或由武装力量执行或支持的。可见“军”还有远远大于“军人”和“军队”的理解,“军事”可能是将各个阶层方方面面都卷入其中的整个社会政治行为。因此,更广泛意义上的军政关系也可以指武装力量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因此要透彻理解军政关系除了了解“军事”之外,还必须理解社会政治。

“政”或“政治”作为主体,可指政权、政府、政党、人民、政客;作为行为,指政治事务、政治合作或政治斗争;作为规范,指政治制度、政治法令、政治道德;作为文化,指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心理,等等。但由于人们对“政治”的理解更加多样,众说纷纭,至少有“阶级现象说”“国家现象说”“道德现象说”“权力现象说”“权术现象说”“权威现象说”、

① 转引自[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管理现象说”、“法律现象说”、“政策现象说”、“经济现象说”、“分配现象说”，等等数十大类之多。迄今没有一个通用的“政治”定义。可见“政”或“政治”内涵和本质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治”观把“政治”的时段主要局限于阶级社会，与国家政权调整阶级关系和实现阶级统治相联系；广义的“政治”观则把“政治”的时段扩大于非阶级社会，与公共权威调控社会关系和实施社会管理相联系。以政治的“管理现象说”为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政治”的广泛性。如中国古代往往将“政”和“治”分开使用，有“政者，事也；治者，理也”的说法。孙中山就曾指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5]692}西方也有人持这种观点。如美国政治学家G·庞顿和P·吉尔认为，“政治活动可以被认为是与对人的集体生活的管理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政治学家麦肯齐也说：“在英国最通用的定义是奥克肖特的定义，即政治是‘参与一个社会的全面的管理过程。’”^{[6]168}无论人们对“政治”的时段、实体、过程理解如何不同，就其共同点或本质而言，“政治”总是以经济为基础又雄踞经济基础之上并对全社会发挥统摄作用的上层建筑，即“政治”始终与人类社会一定时段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有关，与“公共权力”或“公共权威”相连，与“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密不可分。“军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政治”的公共安全职能分化与分工的产物，对脱胎于“政治”的“军事”而言，它与“政治”之间既具有相互分离和相互独立的关系，又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合作的天然联系。

从对“军事”和“政治”时空范围的不同理解出发，虽然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理解和界定军政关系，但笔者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和界定军政关系，即只要是广义的“政”或“政治”与广义的“军”或“军事”产生的关系，以及“军”（军事）“政”（政治）各组成要素之间发生的任何关系，不论大小、主次、先后，都是不同层面的军政关系内容，均属军政关系研究的范畴。

虽然应该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和界定军政关系，但笔者同时主张应该侧重于研究狭义的军政关系，即重点研究狭义的“政”或“政治”与狭义的“军”或“军事”产生的关系，以及狭义的“军”（军事）“政”（政治）各组成要素之间发生的关系。因为我们正处于阶级和国家时代，在阶级社会和国家阶段，“军事”无疑是“国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政事”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个历史时期的“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是整个人类社会军政关系中最典型最重要的军政关系；该历史阶段中“军队”与“政治”的关系，无疑又是阶级社会和国家阶段的“军事”与“政治”关系中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军政关系。侧重于研究狭义的军政关系，显然就抓住了军政关系的重点和要害，不仅有助于促进当前现实军政关系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可以“纲举目张”，对于从理论上全面理解和把握广义上的军政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古往今来，实际上以军政现象为主题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与军政现象密不可分的“军政关系”作为一个重要方面，既为军事思想家所重视，又是政治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①。

① 例如，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专门讨论城邦的“防务”；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讨论了“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援军、混合军和本国的军队”、“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讨论了“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自然希望和平而民主国家的军队自然希望战争”、“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哪些人是最好战和最革命的阶级”、“关于民主国家军队为什么在战争初期比其他国家军队软弱而在战争持续下去时则比其他国家军队强劲”、“关于民主国家军队的纪律”、“略论民主社会里的战争”；等等。

尽管如前所述,军政关系研究也得到遥远年代的亚里士多德等经典作家们的关注,但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乃是当代“发展政治学”的贡献^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亨廷顿的文武关系理论^②。从范畴上看,与在大陆“知名度”比较高的“军政关系”相比,“文武关系”一词在海外学术界的使用频率则要高得多,而后的外延显然更加宽泛。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指出的:“就其广义来说,这一术语涉及社会上的一般公众和武装力量成员相互间所持有的态度和行为,但在这里所使用的是其较为狭隘的、特定的政治含义,它意味着武装力量与合法建立的国家公共权威机构之间所存在的主从关系或上下级关系。”当然“这两者的概念界限在实践中未必总是可行的。”^{[7]122}

西方的“文武关系”概念虽然也有多种解释,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概括来说,“武”,即武装力量,而“文”是指除武装力量之外的所有社会力量,涵盖一切非军事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不仅仅包括政治^③。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所讲的“文武关系”大致相当于我们大陆比较熟悉的“军地关系”和“军民关系”。从地位上看,军政关系是文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亨廷顿所言:“文武关系最基本的焦点是军官团与国家的关系。在这里,功能性压力和社会性压力之间的冲突会合在一起。军官团是军事结构的一个积极的要素,负责社会的军事安全。国家是社会的一个积极的指导要素,负责在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重要价值之间分配资源。军方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通常反映着军官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分析文武关系,首要的是确定军官团的性质。”^{[8]3}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学概念体系“文武关系”中,由于“政”是“文”的核心,“军”是“武”的核心,因此“文武关系”的核心关系实质上也是“军政关系”。

若以军事政治学为基点理解军政关系,在对“军政关系”做出界定之后,那么军政关系便可以从多重标准分类,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如从军政关系的结构角度分析,可以分为军政关系本质、军政关系历史、军政关系主体、军政关系制度、军政关系规范、军政关系行为、军政关系文化、军政关系艺术、军政关系发展,等等;如从时代角度分析,则有古代军政关系、近代军政关系、现代军政关系、当代军政关系;若从国别角度分析,可有中国军政关系、外国军政关系;若从空间角度分析,可有军中军政关系(如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内部的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军事干部与政工干部之间)、国内军政关系、国际军政关系、区域军政关系(如欧盟、东盟等国家集团)、世界(全球)军政关系等;若从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程度角度分析,可以分为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军政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政关系、社会主

① “发展政治学”,顾名思义,以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其对军政关系的关注,体现在对军队与政治发展互动关系的探讨,并产生了大量的军事政治学著作。参见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336页。

② 亨廷顿的文武关系理论集中体现在3本专著中:《军人与国家——文武关系的理论和政治学》侧重于基础性的理论建构,正如作者所言:“本书无意从总体上历时性的描述文武关系,也不打算具体描述其某一方面。而是尝试发展一种观察和思考文武关系的方法,即理论框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则侧重于实践层面的研究,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军队问题。

③ 洪陆训在《武装力量与社会》一书中也是从广义的角度解释文武关系一词的,他认为文武关系是指“武装力量的组织和成员与社会的组织和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于武装力量与社会二者之间,在组织整体、领导者、精英集团和成员,四种不同层次上的关系。在此意义上的‘文’不仅指狭义上的文官或文人政府,而且是指广义上的平民或民间社会。”参见洪陆训:《军事政治学:文武关系理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8—9页。

义国家军政关系、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军政关系;若从学科方法应用的角度分析,或有军事政治哲学、军事政治科学、军事政治艺术等多学科层面。

在当代军政关系研究中,笔者认为特别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军政关系的制度框架:制度的设计基于对理想状态的预期,反映关注“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赋予特定军政关系以正当性^①,而军政关系制度化水平、制度类型及其生成、特征无不与政治生态密切相关^②。(二)党军关系:政党自从产生后便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实体,而政党政治也相应成为最普遍的政治现象,因此将党军关系视为军政关系最核心的内容乃是军事政治学的应有之义。(三)军队政治文化:军事是人类产生以来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职业,作为从业者的军人,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对军事职业本身及其他社会现象具有一套独特的认知、情感和评价,而军队政治文化有3个面向,即关于军队的政治角色、关于军队内部流行的“游戏规则”以及关于与军队“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现象。(四)军政关系的变迁及其诱因:任何一种军政关系既不是与生俱有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都存在质变和量变两种动态;作为大环境的政治生态、外部安全条件、精英的意志和能力等都影响着它的特征和变迁,而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市民社会”^③。

参考文献:

- [1] 洪陆训. 军事政治学:文武关系理论[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 [2] 吴昌恒等. 古今汉语实用词典[Z].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3] 张志和. 军事与政治之关系[M]. 成都:环球印刷厂,1938.
- [4] 大美百科全书第28卷[Z]. 台北:光复书局1991.
- [5] 孙中山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6] [英]麦肯齐. 政治学[M],英文版.
- [7]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Z].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 [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M], Cambridge: Harvard Vintage Books, 1957, p3.

(责任编辑 朱加荣)

① 不同的政治哲学孕育不同的军政关系。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军政关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即使同一性质的社会,军政关系的制度安排也会有很大差异,如中国和原苏联军队政工制度方面的差异。参见洪陆训:《军事政治学——文武关系的理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99—333页,“共产党国家的文武关系”;裘克人等主编:《无产阶级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对此,亨廷顿有过许多精辟论述:“军事机构和军人个人政治化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任职人员的政治组织虚弱到什么程度,以及文职政治领袖处理国家面临的主要政策问题无能到什么程度;一个政治化的军官团在政治上起保守作用或起改革作用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参政范围扩大的程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02页)再比如,他提醒人们必须从政治大背景出发思考军人干政问题,因为“从军队本身去揭示军事干预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军人干政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它乃是不发达国家中的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的特殊表现,这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指各种社会势力和制度普遍带有政治性。在这些国家里,政治缺乏自治性、复杂性、连贯性和适应性。”(《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77页)

③ 相关研究,参见洪陆训:《武装力量与社会》,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07—250页;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Vintage Books, 1964, p19—58关于“军事职业在西方社会的兴起”的探讨。